

当前位置: [网站首页](#) > [学术争鸣](#)

人民·人民性与文学良知——对王晓华先生批评的回复

方维保

文学的人民性问题在世纪之初渐渐的为理论界和创作界所重视，我在2004年《文艺理论与批评》第6期发表了《人民性：危机中的重建之维》一文。文章发表后，王晓华先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意见大体可以将其归纳为两点：一是认为我把“人民”等同于“底层”，把“人民性”等同于“阶级性”，是错误的。这样会导致许多恶劣的后果，那就是把“人民写作”等同于“为底层写作”，从而把白领文学、小资文学都驱逐于人民文学之外。二是，认为人民应该是广泛的，人民就是公民；人民性就是公民性。针对关于人民性的诸多理解，我认为有必要对人民性进行更为细致的讨论。

要讨论人民性，当然要首先讨论“人民”的涵义。

人民和人民性是与民粹主义思想密切相关的一种思想体系。从文化史进行考察来看，“可以肯定的是，民粹主义的始作俑者是卢梭，不是俄国那批要做鞋匠’的青年军官和平民知识分子。法国人说，谁也没有像卢梭那样，给穷人辩护得那样出色。”平民知识分子别林斯基、杜勃罗留勃夫、赫尔岑等人“在睡觉以前不是祈祷，而是阅读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的演说”。俄国革命党人“用俄语复述当年卢梭以法语呼喊过的一切，让·雅克的平民社会观才获得了一个举世承认的学名，民粹主义’。”“虽然如此，真正的民粹主义不是出现在法国，其真正的代表也不是卢梭，卢梭思想代表的是启蒙主义，其“回到自然”说并不是民粹主义所理想的农民“村社”，而是抵制异化的策略。法国不是民粹主义的“故乡”，倒是俄国一大批平民知识分子将民粹主义发扬光大，形成一种有着广泛影响的社会政治运动。民粹主义的人民性思想的产生源自对俄国乡村人民苦难的深切关怀和同情，是俄国资产阶级理论家别林斯基提出的。它所表达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晚期沙俄统治下人民苦难生活的深切同情。显然，在俄罗斯民粹主义知识分子那里，人民就是那些“鞋匠”，那些生活在社会下层的贫民，尤其是那些处于苦难中的俄罗斯农民。

在中国文化史上，知识分子与人民是一个很好理解又被搞得纠缠不清的两个概念。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尤其是左翼文化中，“人民”的界定是与左翼的民族国家想像密切相关的。在中国左翼文化的词典中，人民这个概念是变动不居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内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被纳入“人民”的范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们又被驱逐了出去，变成了人民的对立面——“敌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他们又回到了人民的行列之中来；及至第三次国内战争和3“&”年之后，他们再次变成了“敌人”。而知识分子则一直看作是“小资产阶级”的，他们的地位和身份很特殊，既不是人民也不是敌人，他们是动摇的、依附的、防范的对象。当国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都被“消灭”之后，知识分子于是就成了“敌人”，3“4”年的反右运动和十年“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实际被专政。3“5”年后，随着改革开放，才重新界定了知识分子的“人民”身份。而这样的界定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体力劳动是劳动，精神劳动也是劳动。于是，知识分子就成了人民。同样的待遇在上个世纪“%”年代中后期，又被给予了那些“先富裕起来的人”。其实，知识分子跻身人民的行列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现代中国，都与知识分子的自卑意识有关。俄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一个传统是怀有强烈的自省和自责意识，受俄国民粹主义思想的影响，在3“世纪俄国社会生活与文学艺术中，一直存在!“”#“\$“·文艺争鸣·评论着一种“忏悔的贵族”，它们一方面为俄国的严重落后和下层人民的悲苦境地而悲哀，一方面又为自己的渺小无力而自责，俄国白银时代著名宗教哲学家布尔加科夫说：“俄国知识阶层，特别是他们的前辈，在民众面



收藏文章



阅读量[591]



周访问排行 月访问排行 总访问排行

- 鲁迅和许广平犯有“通奸”罪吗？
- 现实主义还是色情主义？
- “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了吗？
- 不要把张爱玲和胡兰成混为一谈
- 论中西文人女性人体描写的审美特征...
- 文学如何向现实“说话”
- 新诗创世何劳胡适尝试
- 当代文学的若干问号
- 期待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 暧昧的“民间”：“断裂问卷”与90...

网友评论

[更多评论](#)

如果您已经注册并经审核成为“中国文学网”会员，请 [登录](#) 后发表评论；或者您现在 [注册](#) 成为新会员？

诸位网友，敬请谨慎网上言行，切莫对他人造成伤害。

验证码:

前固有一种负罪感。这一种社会的忏悔’，当然不是对上帝，而是对民众或无产者”。五四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深感自身的脆弱和无能，希望通过自身的人民化，以自我救赎。中国现代也存在着这样一个“忏悔贵族”。蔡元培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鲁迅面对着人力车夫的“仰视”的崇拜感受，郁达夫甚至为自己接触了一个烟厂女工而沾沾自喜，感到灵魂受到了洗礼。尤其是’ (0)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整肃的知识分子，尤其希望获得了“人民的身份”。所以，’ (*&年后，广大的知识分子阶层把自己看作是人民，在情感上是可以理解的，如同王先生一样，他们对把自己从“人民”之中排除出去，有着深深的恐惧；他们也会如王先生一样，会用所谓的精神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共同性这样的话语逻辑来为自己的人民身份辩护。中国当代语境下的广泛的“人民”的概念产生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劳动不可能不包括精神劳动”。就是在王先生所特别提到的“知识经济时代”也是如此。

在人民的概念被泛化的背景下，人民就成了公民。公民已经泛及社会所有人群，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是公民，当然也就是人民。不但包括“劳力者”的劳工、劳农阶级，也包括“劳心者”的知识分子阶层、官僚阶层、中产阶层。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之下，知识分子的“人民身份”最初是为了为知识分子“平反”，但它同时也抹杀了知识分子与平民百姓之间的差别。这样的抹杀在当时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待遇”，但却同时也为知识分子免除自己历史责任感打开了方便之门。同样，当那些城市中产阶层也成为“人民”的一部分的时候，“先富裕起来的”有产者和在改革开放中下岗贫困和在城市化过程走向贫困的“失地农民”之间的界限也被抹杀了。好像大家你我都是公民，都是平等的，但实质是有产者的公民意识甚至是主人意识日趋强烈，而那些走向贫困的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不但没有公民意识甚至处于一种失语状态。也正因为如此，波斯波洛夫和列夫·托尔斯泰所倡导的“真正的人民性就是全民性”在俄国文学史上“不占上风”，对中国现当代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还有就是，从逻辑上来说，当一个概念可以指称一切的时候，这个概念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当人民就是公民的时候，人民当然也就是没有必要存在了。

知识分子在中国语境中，他从来都只是人民中的特殊的“一部分”，从来就不属于人民——社会底层。“人民”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阶级论框架中，“人民大众”“人民群众”既不是指全体国民，同时也不是先天上具有种族特征的群体。从阶级尺度看，人民是无产者（“资产阶级”的对立面）；从文化尺度看，人民则被界定为“知识阶层”的对立面。这是中国左翼革命出于革命的需要所设定的。”

结合中国文化史，“人民”的汉语本义，所指称的就是黎民百姓。而知识分子则是“士”，并且“学而优”则成为“仕”。知识分子和人民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当然不是“人民”。在中国“五四”前后，虽然在“劳工”“、庶民”“、平民”“、民众”、“人民”等词语的理解上，知识分子还存有许多疑问，但基本含义是“下层民众”，即穷人、劳工阶级、农民。

因此，在我的文章中，我也基本是“自觉不自觉地”将人民等同于“底层”，“自觉不自觉地”将人民性写作等同为某个阶层写作——如底层——写作”。

在谈论了“人民”之后，那么再来看看“人民性”是什么？

人民性，从一般的意义上来，它就是人民特性的本质性概括。俄罗斯民粹主义者将人民性赋予了“人民精粹”的思想。他们将它与人民的优良品行相联系。正如别尔嘉耶夫所指出：“民粹主义是俄罗斯的特殊现象……斯拉夫主义者、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年代的革命者都是民粹主义者。把人民看作真理的支柱，这种信念一直是民粹主义的基础”。民粹之意，乃是人民的精粹，谁是人民的精粹呢？民粹派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是人民的精粹，农民也是人民的精华，#“知识分子受到两种力量的压迫：沙皇政权的力量和人民自发的力量。后者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隐秘的力量，知识分子自身与人民是截然不同的，它感到自己有负于人民，它希望为人民服务。‘知识分子与人民’这!”一命题纯然是俄罗斯命题，西方很难理解。”!在民粹主义者那里，人民是一个活在精神中的形象，它是浪漫主义想像的成果，带有强烈的情感皈依的色彩。这种引申义上的民粹主义表现为把没有知识文化的底层劳动者（不仅仅是农民）无条件地神圣化，认为只有他们才是道德高尚、心地善良、灵魂纯洁的。五四时期蔡元培提出“劳工神圣”呼号、延

安”时期毛泽东发出“做农民的小学生”号召、文革”期间“根正苗红”的工农血统论，便是民粹主义引申意义泛化运用的典型表现。

其实，就一个社会阶层来说，说这一阶层在人格上是优越性，或是卑劣的，都是不恰当的。因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其个体人格是复杂的，是无法进行概括性描述的。而二元对立思维却偏偏要给人民”或“群众”进行这样的描述。知识分子把人民描述为精华，是出于自我救赎的需要，但现实中的人民却往往与“理想”差别很大。于是就出现了民粹主义和启蒙主义之间的矛盾。平民主义波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新文学最初的创作实绩，如诗歌中的“人力车夫派”以及鲁迅小说对民间苦痛的深刻揭示和温情关怀，都体现了这一思想取向。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平民”崇信，“庶民”道德优越性的张扬与首肯；另一方面是民众的昏睡和启蒙者的极度失望。“五四”前后的一批知识分子都曾陷入启蒙主义与民粹主义相互纠缠、对立的矛盾深渊。

民粹主义人民精粹思想之下，人民当然必须是“先进”的，人民怎么能是“落后”的代名词呢。正是民粹主义观念的作祟，使王先生的观点成了典型的民粹主义的人民优越论。他只允许对人民进行精粹想像，而不能对人民进行“落后”想像。

传统的民粹主义思想将人民想像为一个理想的实体，将它与历史进化链条结合起来，而我所要说的是，其实“人民”历史和政治的内涵都直接指向社会底层，它是一个概略性的描述，它与用精神劳动还是用体力劳动无关，它与与是否代表先进或是落后生产力无关。但文学艺术中的人民性，与社会学范畴的人民性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左翼文学曾经在民粹主义的人民性思想的影响之下，试图建立符合民粹主义理想的文学艺术“人物”，伟大的人民的形象。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从未出现过作为“精粹”的成功的人民形象，中国现代的理论家和作家都曾对人民性进行了想像，但是，现实主义作家如鲁迅、老舍的笔下人民大多是值得哀怜的人民形象；鲁迅《一件小事》中“车夫”虽然伟岸，但伟岸得如此的可疑。真正建构了“精粹”的人民形象的是高尔基之后的苏联文学和中国现代左翼文学，但所建构出来的却是“高大全”式的人物，一种被高度政治化了的精粹的人物和人格。这样的人民形象其实都已经不是人民而是主流意识形态所塑造的“政治贵族”。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失败的局面，其本质在于，人民性从来都是知识分子制造出来的所谓人民共同体的想像的德性。

那么人民性，尤其文学艺术的人民性其实还是在于作家的情感立场。我们现在说杜甫的创作的人民性，杜甫有没有塑造出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民形象？当然没有。而我们之所以说他的创作具有人民性思想，其实说的就是他的对于战乱中的人民的深切的同情。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全部的俄国民粹主义都起源于怜悯与同情。在#年代，忏悔的贵族放弃了自己的特权，走到人民中间，为他们服务，并与他们汇合在一起。”人民性是“人民同情”的立场。我反对民粹主义的对于人民性的想像性建构，而主张回到人民同情的原初的立场上来。

中国文化的当下语境恰恰缺少的就是这样的“怜悯和同情”。在资本的合谋之下，两极分化日趋严重。而上世纪!年代后期剧烈的社会震荡和%年代的商业化浪潮，一方面使知识分子的情感俯首于犬儒哲学，另一方面使他们认同资本真理。知识分子被普遍地中产阶级化了，文学艺术粉饰着深刻的危机，风花雪月呈现着富足安康。而与此相反，普通百姓不但生活被置入了深渊状态，而且普遍地处于失语和噤声状态。

正是这样的背景倡导文学的人民性便具有了特殊的意义（正是它促使了人民性文学思想的回潮）。

一切皆源自深切的“怜悯和同情”。我们今天重新倡导人民性，不是要为阶级斗争的人民主义招魂，而是要借助于人民性重新唤醒消费社会、权力社会中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唤醒他们内心中的人道主义同情，唤醒他们作为社会的精英所应该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在这样的情况下，重新倡导方维保·人民·人民性与文学良知!""#%·文艺争鸣·评论人民性，就是要求作家和评论家为人民“代言”，代那些草根阶层发出苦难的呼号。

在这里，另外一个问题随即产生，也就是王先生所担心的“人民话语霸权”问题。但是人民性可能等同于阶级性，但阶级性就一定会导致“斗争的逻辑统治了文学艺术家”的结果吗？在革命现实主义那里，将人民性与阶级斗争思想挂钩，从而使人民具有了更加复杂的内涵。民粹主义之所以能够同马克思主义实现融合，重要的是他们都看到了社会中存在不同利益阶层和这些阶层之间的矛盾。但是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家在对民众进行表现的时候，受到强烈的历史冲动的诱惑，他们主张从历史的必然趋势”去表现民众，当早期的革命文学作家还处于在野地位的时候，他们还能够对底层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但就是这样他们的历史本质论往往使他们对丰富的民众生活被抽象、简单化为单一的阶级斗争，作家的主体存在被无条件取消，写作就是作者走向群众、参加斗争的实践过程。人民的形象也就塑造为高大的工农兵的形象，一种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工农兵。民粹化背后潜隐的元话语仍然是革命的需要，现实斗争的需要。人民同情的思想消失了，剩下的只有人民精粹的思想。

正如有的理论家所看到的，在特定的革命语境中，“由于人民被定义为特定阶级为主体的群体，因此，是否属于人民便取决于特定阶级的认可，阶级之间的冲突则被表述为人民与敌人的冲突。被认作‘人民’一员成为个体最重要的护身符。几乎所有人的命运都决定于‘人民’的选择和判决。如果‘人民’不要他了，那么，他在这个世界上将无藏身之地，只能被囚禁和走向毁灭。于是，以‘人民’名义所造成的大悲剧成为我们这个民族无法忘却的苦难记忆”。！

对于人民诗学的痛苦记忆是可以理解的。但这里同样存在着思维的跳跃以及由于这种跳跃所造成的逻辑的脱钩：“人民被定义为特定阶级为主体的群体”，与“是否属于人民便取决于特定阶级的认可”，并不能构成紧密的逻辑链条。前者是一种社会学的定义，人民这一特定的阶级群体是被描述的对象，是被动的客体；而后者这个“人民”显然具有了特殊的权力，甚至具有“认可”“选择”“判决”“囚禁”“毁灭”的权力。这样的权力是那个被描述的群体拥有的吗？是那个被同情和怜悯，自己不能发出声音而只能借助于知识群体而发出声音的群体所拥有的吗？都不是，我们把不是“人民”的所作所为强加在他的身上，把帐算在了他的头上。我所倡导的人民性并不主张对知识性和其他阶层的个性的排斥，它不具备霸权的性质。我考虑到了人民性这一概念的历史积淀，以及这一积淀所导致的人们的习惯性恐惧，我尽力地将人民性灌入人本精神，主张人民性应该包含着生命主体的平等意识。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所倡导的人民性，不是要建构一种人民人格。人民性，只是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文学的人民性自它产生的时候起就与社会阶层的贫穷和富裕的差距相关，就与知识分子的人民同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相关。它虽然曾经被绑在阶级论的战车上，导致了虚假的人民性，但并不能改变人民性指向底层的本质。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说，它是艺术家的创作姿态。它不是对人民特性的具体的概括和描摹。建构一种人民文学，所要建构的是一种作家的题材选择倾向和情感表达倾向，人民性是文学的。倡导人民性就是要求作家对人民起一种深刻的“悲悯和同情”，正是这种深刻的悲悯和同情使人民文学具有神性的光辉。从美学的角度来说，正是深切的同情和怜悯使文学具有了诗性的光辉。

最后我想起了勃洛克的一句话，他说：“即便我们久已不再对人民顶礼膜拜，我们也不能背弃或不再关心人民，因为我们的爱和思想素来倾向人民。””

注释：

1、7王晓华：《我们应该怎样建构文学的人民性》，《文艺争鸣》，2005年第1期。

2朱学勤：《道德理想王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11页。

3、5、6文池主编《俄罗斯文化之旅》，北京新世纪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页，第169页。

4陶东风：《大众化与文化民族性的重建——社会理论视野中的58、59年新诗讨论》，《文艺研究》2002年3期。

8.勃洛克：《人民与知识分子》，转引自刘小枫《象征与叙事——论梅烈日柯夫斯基的象征主义》《浙江学刊》2002!年1期

原载：《文艺争鸣》200505

关于我们 | 联系方式 | 意见反馈 | 投稿指南 | 法律声明 | 招聘英才 | 欢迎加盟 | 软件下载
永久域名:www.literature.org.cn www.literature.net.cn E-Mail:wenxue@cass.org.cn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京ICP备05084176号